

# 关于钱锺书早期西文藏书里的几处批注

张治

通过翻看钱锺书在早年一部藏书里的批注,既可看到他当时读书治学的趣味,以及影响到后来著作的观点,也可看到他涉及自身的评述,还夹杂了新近的诗作,又有德语古书写体的偶尔灵光一现。

近日,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四部钱锺书的早期西文藏书。承蒙胡晓明馆长允准,我得以看到其中一本书的部分页面翻拍照片,都是有钱锺书批注内容的。遵照胡老师的嘱咐,我对此略加辨读和查考之后,觉得有些内容确实值得一谈。

我看到的这本书,题为《品藻集》(*Res Judicatae, Papers and Essays*),1892年伦敦艾略特·斯托克公司出版,是一本不算厚的文学评论小册子。作者奥古斯丁·柏莱尔(Augustine Birrell, 1850—1923),是一位政治家,后来出任过爱尔兰首席秘书,也擅长写一些短篇的幽默小品文。从此书末页钱锺书写下的总体评价看,他还读过这位作者写的第一部著作,《附言集》(*Obiter Dicta*, 1885),以为出语精妙可喜,自成风格。而在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读柏莱尔两部著作的笔记,一是《往事正误录》(*Things Past Redress*, 1937,第5册第637—639页),一是《以饱蠹楼之名》(*In the Name of the Bodleian, and Other Essays*, 1905,第32册第67页)。

根据《品藻集》的精装环衬页上所贴的藏书票和书店标签,以及扉页上的题署来看(图②),这是钱锺书1936年5月15日在牛津宽街(Broad Street)27号的“帕克尔父子公司”(Parker & Son, Ltd.)购得的二手书,这个公司在当时已是一家百年老书店,后来又经扩建和重建。这本书原来的主人名叫 Ernest William Adair,生平不详。但是书里的铅笔批注显然都是我们熟悉的钱锺书字迹。

第一篇关于作家萨缪尔·理查森(Samuel Richardson, 1689—1761)的一篇演讲录,第6页页旁钱批:

All thus as criticism is, as Ste-Beuve was fond of saying, à côté. But the man who reads Birrell for critical integrity, deserves the fate allotted by the “great lexicographer”, to the man reading the “little printer” for story — perhaps even il ne vaut pas la

corde qui le pend!

译文:所有这些作为批评,都是类如圣伯夫所喜言“在边上”(à côté)的。不过,为批评之完整而读柏莱尔的人士,实在该当那位“大辞书家”所指派的命运:成了为故事而读那位“小印刷匠”的人,——这大概还更没有什么价值吧!

根据上文,“大辞书家”指的是编词典的约翰逊博士,“小印刷匠”则是理查森。结尾这句法国谚语,字面意思就是“吊杀还不值绳子钱”。其中的短长之较,我在此不能深究,只想指出:钱锺书拈出圣伯夫常说的“在边上”(à côté),也许就是《写在人生边上》这个题目的由来?

以下是读《爱德华·吉本》一篇的几处批注。第39页涉及吉本对于天主教的态度,钱锺书批注:

J. Cotter Morison has put it very finely in his Gibbon: “Grounds which G. dasched over in a few weeks, Newman took 10 yrs to traverse.”

译文:科特·莫里森非常精确地在他的《吉本》一书中提到:“吉本用了几周时间所猛烈冲击的领域,纽曼花费了十年来进行全面探讨。”

这位莫里森(James Augustus Cotter Morison, 1832—1888),是英国的随笔作家,这本《吉本》(1878)是他广泛阅读和精巧分析的代表作。钱锺书引的这段话见于此书第17页。纽曼就是1833年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,约翰·纽曼博士(Saint John Henry Newman, 1801—

1890)。牛津运动起初旨在恢复英国国教中的某些天主教义和仪式,最终纽曼等人偏向罗马教会。钱锺书后来曾详细阅读过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,吉本宗教思想里的复杂和对后世的重要影响,此时他应该已经有所体会。

第54页批注:

The tu quoque is that Ste-Beuve owed his religiosity not to his mother, but to Mme Hugo — witness *Les Consolations*.

译文: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圣伯夫的宗教情感并非得自其母,而是归因于雨果夫人——由《慰藉集》可证。

这里的 tu quoque 是拉丁语,“你也一样”的意思。这页书中谈及吉本在自传里声称父母对自己影响不大,从未体味到童年的幸福快乐。于是引述圣伯夫对这段内容的评价,其中指出缺乏母爱关怀时丧失最多的就是宗教情感。因此钱锺书又搬出批评者自身的情况进行同理论证。圣伯夫这位深受钱锺书喜爱的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大师,是个遗腹子,家境清寒,自幼生活在孤寂和忧郁之中。二十岁出头得到维克多·雨果的赏识,又因为比邻而居,以至长年每日会面不止一次。这期间他爱上了阿黛尔即雨果夫人,为此最终与雨果决裂,并终身不娶。钱锺书提到了圣伯夫年轻时写的诗集《慰藉集》(译名出自范希衡),其中第一首和第五首都是献给雨果夫人的。其中有“你如此高贵而纯洁”(Vous si

noble et si pure)、“人活着时,就会相爱”(Et quand on vit, qu'on s'aime)这样的句子,以及对于死亡、天堂和天主的思考。

第55—56页有一段跨页的批注(图③):

Even in Sir Wm Hamilton's time Oxford was the very nadir of learning (See *Discussions*). The indictment of Oxford began probably with Bruno (“The Widow of True Science”, *Opere*, i. 179) and stops so far with my humble self. (拾骨腐生学,闭心上士居;声犹闻蟋蟀,技只注虫鱼;地自蠹尘甚,人多尸气余;珉珠差可识,怀璧罪从渠。) But the “dreary” Cantabrigdian “Collection of animals” (to borrow Gray's phrase) is surely, compared to Oxford, but bonnet blanc and blanc bonnet.

译文:即便是在威廉·汉密尔顿的时代,牛津也是学问的低谷(见《论丛》)。牛津的衰败迹象或许开始于布鲁诺(“真正科学之遗孀”),目前停留在这卑微的我自身了。(中文诗略)但是那些“沉闷的”剑桥“珍禽异兽”(借用格雷之语),相较于牛津而言,确实也不过彼此彼此了吧。

这段批注针对的正文,涉及吉本在牛津的学习时光,就是其《自传》里谈到过的。吉本十五岁时,“带着足以迷惑一位博士的一大堆学问,同时也带着足以使一名学童感到羞愧的愚蠢”,进入了大学,他在马格

德林学院度过的十四个月,被称作是“一生中过得最懒散、最没有收获的日子”。柏莱尔评价说,吉本时代的牛津大学体制还不健全,缺少公共考试制度,没有班级名册,但假如吉本步其父之后尘去了剑桥,那么他会发现数学甲等考试(Mathematical Tripos)这种障碍(与后来的制度不同,在吉本的时代,这场数学考试是剑桥学生获得荣誉学位的唯一途径)。我们想起钱锺书并不杰出的数学成绩,相信他一定庆幸进的是今天的牛津。因此,虽然这里讨论的是牛津学风的衰败,但也拉过剑桥来进行对照,批注里的“bonnet blanc and blanc bonnet”是一句谚语,类如“半斤八两”的意思。威廉·汉密尔顿(Sir William Hamilton, 1788—1856)是一位苏格兰玄学家。在他的《哲学、文学与教育论丛》(*Discussions in Philosophy,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*, 1852)中,多处涉及对于牛津大学逻辑学课程衰落的批评。但钱锺书应该指的是他抄在笔记里的一段内容(《外文笔记》,第32册第45页; *Discussions*, p. 125):当时有人建议牛津取消逻辑学课程,引起众多在校生的欢迎。汉密尔顿说,这些人长期以来都在狂热地随同圣安布罗斯一起祈祷:“主啊,把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里解放了吧”(A dialectica aristotelis libera nos, Domine)。布鲁诺的话是在他1583年访问英国时候说的,

(下转6版) →

